

“东方威尼斯”

一个京剧女演员的传奇



王 火



“东方威尼斯”一个 京剧女演员的传奇

王 火

山东人民出版社

**“东方威尼斯”一个京剧
女演员的传奇**

王 火

*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75 印张 2 插页 211 千字

1983 年 7 月第 1 版 198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7,700

书号 10099·1701 定价 0.98 元

序

王火同志把他二十年来在文学园地里辛勤笔耕的成果，集结出版，奉献给读者，这是一件好事。但王火同志却给我出了一个难题，要我为这个短篇小说集写一篇序。开始，我感到惴惴不安，觉得是难以胜任此事的，但又觉得盛情难却，可以借此为王火同志的第一个短篇集问世助兴，也是未尝不可的！

作为一个革命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是要以真善美去教育、启迪、感染读者，陶冶人们的情操，激发人们的积极向上的热情。因而作家自己必须严格地要求自己，自己要做一个人，具有高尚品德的人。文如其人，王火同志在他的作品中总是注入深刻的思想，提炼严肃的主题。他长期做党的报刊编辑和教育工作，培养了他一种高度的革命责任感，他把这种精神带到文学创作中，就是注重文艺的教育作用，注意作品的社会效果。王火是从旧时代走到新社会的，他对国民党黑暗、腐败的法西斯统治，耳闻目睹，有很深的体验，他曾经在解放战争时期，支持、掩护、营救过中国共产党地下党的同志。他作为一个进步的、耿直的知识分子，曾经欢欣鼓舞地迎来共和国的黎明。旧时代的黑暗和新时代的光明在他思想中都有强烈的印记。《心弦铿锵》中就通过冶金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陈一民入党时的回忆，描绘了知识分子在旧社会的遭遇和在新时代的幸福。陈一民入党了，他非常兴奋，“好象有各种音

符在我的心弦上强烈跳跃，有什么声音在心里翻滚。”但与此同时，他却想到了被黑暗的旧世界所吞噬了的老友张天仇。作者为此而激动不已地直抒胸臆：“象他这样的人，本来是人民的珍宝，可以为人们做出贡献的，可是却象一根野草似的，被冷酷、反动、腐化、漠视……的魔爪捏断了，被反动法西斯的野火烧毁了！”

《春风桃李》中通过欧阳老师所讲述的李薇的遭遇，对旧社会提出了强烈的控诉。李薇是欧阳老师所欣赏的才华出众的学生，但贫困使她不仅不能维持学业，而且债主还要逼她去当舞女。作者情不自禁地对旧世界发出强烈的质问。欧阳以一个正直的教师的职责和情操，去尽力帮助李薇，在思想上开导她，在经济上帮助她。她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海啸曲》所表现的是非洲人民的斗争生活，作品中的瓦德扎加，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牺牲了爱妻和爱女扎加。作品插入了对老马在旧社会遭遇的描绘，使之互相映衬，表现了中国人民和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遭遇是共同的，这正如瓦德扎加所说：“帝国主义的子弹打了你们中国兄弟，也打了我们非洲兄弟！”

读着这些作品，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作者那颗滚烫的、跳动的心，作者是那样执着地热爱我们的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社会，热爱领导中国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战斗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国共产党。作者这些深刻的思想，不是空洞的、概念化的说教，而是通过真实的生活场景和艺术形象加以体现的。我们的文艺，可以有各种作用，但我总感到它有最基本的作用，这就是它作为革命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应当以革命的思想，去教育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使他们懂得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使他们懂

得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能离开党的领导，使他们懂得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加珍惜生活、珍惜生命，激励他们为祖国的革命和建设，贡献出自己的一切。王火同志的作品是在努力去完成这个任务的。

王火同志的作品，不仅激发人民去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而且在更多的作品中通过生动的人物形象，教育人们应当如何立身行事，如何做一个真正的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马庆贞的奇遇》中的马庆贞，是一个雷锋式的三好学生。这个纯洁的孩子所想、所做的都是助人为乐。她冒雨帮助郭家姥姥去送东西和解放军帮助她去学校的故事，都生动地说明了新社会人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如果说作者一九六三年所写的这篇作品还仅是一般的好人好事的描绘，还没有更加深刻地揭示人物的心灵美的话，那么，在经过十年动乱之后，作者则对人物的内心世界作了更深刻的开掘，更加认识到道德情操的重要意义。不仅对人们的美好的心灵和情操加以歌颂，对丑恶的思想和灵魂进行鞭挞，而且还通过细致的心理解剖，写了人们的内疚、自责、悔悟等等的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而且通过这些描绘，服务于一个目的，就是应当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写于一九七九年的《滚烫的回忆》，通过“我”的心理活动的描绘，揭示了“我”这个“不犯错误的好干部”的思想本质和虚伪性，表现了“我”的“负疚”“自责”的复杂感情。作者真诚地告诉我们，应当怎样做一个忠诚的革命战士，告诉我们应当怎样透过历史的迷雾去分辨真正的好人和坏人。作者从自己还没有人生经验的孩子亮亮在戏剧、电影中简单地区分“好人”“坏人”，写到孩子们“还意识不到一个人在‘好’的幌子下可以干坏事，而在‘坏’的帽子下干的也不一定是坏事。当两类

不同性质的矛盾被混淆的时候，当民主与法制被践踏与破坏的时候，孩子更无法理解一个革命者会突然变成为‘反革命’，而一个‘不会犯错误的好干部’，实际上却距一个真正的革命者的标准很远，很远。”作品中的何秉康是一个年青、干练而又有些自信、执着的共产党员，他的妻子李楠是一个聪颖、善良、貌美的中学语文教师。他们在孩子亮亮的眼中曾经是“顶好的人”，这不仅是孩子的看法，而“我”通过日积月累的接触和体察，也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在何秉康和“我”进行调查研究时发现了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而又当“我”生病住院，由何秉康写了一份报告以后，何秉康的厄运到来了，他被划为“右派”。李楠也因不能与丈夫划清界限而成为“右派”。于是，顿时成了“坏人”。作品思想的闪光还不仅在于何秉康夫妻的遭遇，而在于通过这个奇特的事件，“我”的内心世界的深刻解剖。因为这份构成何秉康“右派”罪证的报告本来应当是由“我”写的，而仅仅因为偶然性的因素，何秉康写了，他便成了“右派”，“我”便成了“不会犯错误的好干部”。“我”被强拉着写批判稿时，“比刀子刺心还痛苦”，在批判大会上，“我”昏厥过去了。“我”的强烈的自责是感人肺腑的。“谁心里没有一杆秤呢？我，却得了另外一个结论，那就是：仅仅为了孩子，我也只能做好人，不能做‘坏人’！何况还有叶娟！小何说：革命者在党的面前应当是一个‘透明体’，能行吗？不，我不但不能做‘透明体’，简直想用一块厚毡将我自己紧紧包起来。”“我”还没有昧着良心对何秉康进行批判，甚至对他表示了同情，而且在农村还偷偷地去看望过他，这可以说是一个好人，但距离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又是相差何其远啊！所以当何秉康平反回到编辑部以后，“我”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有欢乐，也有悲伤，更有

愧疚！”作者这种无情地解剖自己的精神，表现了火热的革命激情和对一个革命者道德情操的高标准的要求。我记得有一次作者曾经对我谈到他经历中的一次偶然性的遭遇，因为他有事而没有参加一次会议，幸免了一场大祸。作者谈这件事时，一是为自己免受迫害而庆幸，同时也为参加会议的无辜受害的同志而悲痛。我想，作者在写《滚烫的回忆》时是熔入了自己这种真切的感情了吧！

写于同一年的《错误的歉意》，可以堪称为《滚烫的回忆》的姊妹篇。如果说《滚烫的回忆》中的“我”是因为偶然性的因素而造成了何秉康的坎坷遭遇的话，那么，《错误的歉意》则是由于出于一个人民教师的职责，教育学生去堂堂正正的做人，而给学生招来大祸，蒙受不白之冤。宿勋是一个耿介、忠诚的学生，他怀着建设自己家乡的强烈愿望回到了农村。篡夺了村支部领导权的“马造反”伙同绰号“圣手书生”的会计贪赃枉法，而又要宿勋上他们的圈套。在这种情况下，“我”出于一种对学生的爱护心，一种教育工作者的责任感，劝宿勋不能和他们同流合污，宿勋照“我”的意思办了，但却遭到了残酷的打击和迫害，被搞得家破父亡。“虽然宿勋并没有表示对我有任何怨恨或遗憾，但一种歉意却始终折磨着我……”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宿勋的沉冤得到了昭雪，使“我”又恢复了一个教师的信念，一个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教育工作者的信念！通过生动的故事告诉人们，在我们的时代，由于种种原因，可能造成冤案，但是，我们的党是英明的，我们的制度是优越的，总有一天，真理、正义会得到伸张。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能苟且偷安，应当努力去做一个正直的、诚实的人，做一个真正的革命者。

《复杂的颠倒》写的虽然是人们如何努力愈合“四人帮”给

带来的严重精神创伤，而作品所蕴含的深刻思想，也是开掘人物的心灵美，用社会主义的伦理道德规范去要求人们的言论和行动。作品中所写的在革命战争年代曾经冒着生命危险掩护地下党同志，在“四人帮”的淫威下宁死不屈的革命老人李云馨，自然象高洁的青松。而在“四人帮”的极“左”路线影响下做过错事的汤永芬，在深深的悔悟和负疚中清醒过来，毅然改正错误，历尽波折，受尽委屈，为李云馨的平反而奔走呼号，终于恢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她的心灵也是美的。作者所期待的是一个同志间都互相体谅、和睦相处的情景。

其他，如《丑角》《不要飘带的花圈》《“东方威尼斯”一个京剧女演员的传奇》《迈向美的足印》都在孜孜不倦地、从各个不同的侧面去探求人们的心灵美，努力使中国劳动人民几千年来所形成的传统美德、高尚情操，在新的时代，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迸发出耀目的火花。这可以说是王火同志短篇小说创作中占着重要地位的主题。

王火同志的短篇小说，朴实、自然、真切、生动，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这是他坚持从生活出发的结果。我感到王火同志并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作家，他的作品不是兴之所至、一挥而就的产物，他是把脚坚实地立在现实生活的土壤中，一步一个脚印地，带有几分艰辛地走下去，他象一头忍辱负重的牛，在文学园地里不停顿地精耕细作。王火同志的作品，初读起来，似乎没有什么惊人之笔，但仔细咀嚼，就能品出其中之三昧来，使人不能不敬佩他生活阅历之广，对生活的体察之周，对人生的理解之深。读着王火同志的作品，似乎都感到很亲切、熟悉，使我不能不惊讶于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的脚步结合得是如此之紧密。他是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采撷花朵，编织自己的

花环的。在他的短篇小说中，以学校为题材和教育工作有关的题材几乎占了一半，这是与他长期担负学校的领导工作的缘故。他的不少作品中有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地下斗争生活的，这是与他曾经接近过地下党同志有关的。他的描绘国际斗争生活的《海啸曲》，也并非是他的猎奇之作，而是由于他曾经参加了一九六〇年的世界工联北京会议的宣传处工作，接触到一些第三世界的工人弟兄，他们的悲惨经历调动了他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的生活，而激发了创作的灵感。作品中把对瓦德扎加的苦难经历的描绘和中国工人在旧社会的痛苦生活的描绘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作品具有较强的真实感。王火同志在“文革”前创作的数量并不多，在粉碎“四人帮”以后，重新拿起笔来，则大有一发而不可收的势头，不仅短篇创作在全国及本省报刊上一篇篇问世，而且写了一些长篇小说、中篇小说、电影剧本。文友们相聚在一起，每每惊叹王火同志创作精力之旺盛，产品之多。这自然是由于党的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党正确地执行了文艺路线、方针、政策，调动了他的创作积极性，但无可否认的是他的生活库存是丰富的，过去由于极“左”路线的影响，不能充分地反映出来。现在，在党的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总口号下，可以有作家自由驰骋的广阔天地，把王火同志的创作热情激发起来了，使王火同志半生经历所积累的生活点燃起来了，使他的创作不仅有量的增加，而且有了质的飞跃，在他的创作道路上树起了新的里程碑，步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请看《新“三岔口”》，表现了作者多么深厚的生活底力啊！这里没有矫揉造作的言词，没有眩人眼目的离奇情节，写的就是生活本身。从三个小小“当权派”在“文化大革命”中所演出的一幕“三岔口”里，勾画出了三个思想性格不同的艺

术形象。作品的价值还不仅在于对这走马灯式的“三岔口”情节做细致、逼真的描绘，而还在于透过这真实的画面所揭示出来的生活的真谛，那种耐人寻味，发人深思的东西。作者写了柴登高和夏永青在斗争漩涡中赤裸的思想灵魂，但没有漫画化、简单化，而是生活化了。就以柴登高抛出“我”来说，在柴登高的思想中，反正要选择一个批斗对象，不选“我”去选谁呢？似乎是理所当然，合乎情理的，因为“我”出身不好，又有“工作错误”，而且柴登高说等到运动后期还会“正确处理的”。但是，就是在这所谓有“理”合“情”之中，写出了内在的没有理，不合情。再以夏永青“好态度”，密告柴登高来说，似乎也是有“理”合“情”的，因为，谁也愿意走出“牛棚”，谁也不愿意做“坏中之坏”。但是，就是在这些描绘中，显示了夏永青的私心杂念，在他那貌似“革命”的言词中，露出他灵魂中的“小”来。对于“我”的描绘，也是充分现实主义的，是从生活出发的，并没有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作人为地拔高。作者对“我”的心理描绘，是维妙维肖、丝丝入扣的。

作品中的“我”，是一个正直的人，他从未想到去卖友求荣，就是在别人做了对不起他的事的时候，也总是设身处地的去为别人着想，去体谅别人的处境，同情别人的遭遇。这个诚实、善良、正直的“我”的形象，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想，如果作者不是有深厚的生活和对生活的深刻的体验，不是坚持从生活出发，是写不出这样的撼人心弦的作品来的。再以《滚烫的回忆》来说，对极“左”思潮影响下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被歪曲做了真实的描绘。仅仅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我”就幸免了灾难，而何秉康则成了右派，这看来是偶然性的，但却是有现实生活作为基础的。特别是“我”这个“不会犯错误的好

干部”，是个好人，但却没有鲜明的爱憎和是非观念，“倒也并不是真的弄不清，而是我为了要做好人不做坏人，眼见是非而不愿直说，心有爱憎而不想明言，四平八稳，小心翼翼，小心翼翼。”这样的干部，应当说是所在多有的。这个形象是作者的创造，是在现实生活中提炼、概括的“这一个”艺术典型。除《滚烫的回忆》中的“不会犯错误的好干部”的形象以外，这类干部的形象，还有《新“三岔口”》中的那个总是以好心揣测别人，从不伤害别人，而总不免挨批挨斗的副校长。还有《错误的歉意》中那个以一个教师的责任感劝告学生做一个真正的人，而学生却因此遭难，自己深深负疚的人民教师的形象。这类人物在生活的激浪的冲击中，虽不算中流砥柱，但却都是正直的人，他们具有中国人民善良、耿介的道德品质，但作者并没有完全肯定他们，而是含着眼泪鞭挞了他们的软弱以至私心杂念。他们较之嫉恶如仇、大公无私、勇于斗争的革命者，还有相当大的差距。作者对这类人物，也可以说是爱的，同情的，但又不满于他们的软弱和自私，诚挚地希冀他们坚强起来。从这些形象的描绘中可以看出，作者对于部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是比较熟悉的，如果作者没有深厚的生活积累，没有对干部和知识分子的深刻认识、理解，是不可能把这些人物塑造得如此活龙活现、栩栩如生的。

由于作者生活面较广，所以他笔下的人物形象也是多种多样、各呈丰姿的。不仅有上述的大量干部、知识分子的形象。还有对认识了自己的错误、执着地、披肝沥胆地努力弥合过去的创痕的汤永芬（《复杂的颠倒》）；有在十年浩劫中历尽艰辛，遭受残酷的迫害，在人生的道路上坎坷不幸，但却体谅、关心别人，具有高尚的情操的京剧演员薛慧秋（《“东方威尼斯”一个

京剧女演员的传奇》)；有热爱祖国，追求光明，最后英勇牺牲在国民党屠刀下的知识分子张天仇(《心弦铿锵》)；有勇于和国民党反动派作斗争的老工人丁老翼和继承父志、发扬革命传统的青年工人丁小翼(《红斧》)；有深明大义、对子女严格要求的革命妈妈(《不要飘带的花圈》)。这里我愿意特别提一下《丑角》中的那个京剧团的青年演员的形象。这个人物是有自己的个性的，他在舞台上丑角，但在生活中却是有鲜明的善恶和是非观念的，他对世俗的东西，对于生活中的丑的行为是鄙夷的，但他对丑的行为的讥讽有自己特有的方式，是富有喜剧色彩的。他是以一个演员所能做到的特殊方式，制止了那两个采购员的不讲公德的行动。他在生活中所扮演的这个喜剧演员，演的是一个可爱的正面角色。这个青年京剧演员具有一颗高尚的心，这个形象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王火同志在艺术上是一个不倦的探索者。他的创作具有朴实的风格，但在写作方法上，却是变幻多端，作了各个方面的尝试的。王火同志对我国古典小说的传统手法不仅很谙熟，而且运用自如。与此同时，他还很重视吸取外国的艺术手法。并运用自如地把我国古典传统手法和外国的艺术手法加以融化，来为表现新的现实生活服务，为塑造人物服务。这突出的表现在他的作品既有完整的故事性，又有深刻细腻的心理剖析，使人物在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心理描绘中站立起来。在《复杂的颠倒》中就把曲折的故事情节和心理描绘结合得比较完美。作品以玉泉坊的居民为描写对象，描绘了广阔的生活场景，揭示了生活中的复杂的矛盾，展示了家庭和人物的命运。而其中特别是汤永芬为了给“文化大革命”中挨整致死的革命母亲李云馨平反的曲折过程，构成了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在故事情节发

展的整个过程中，始终结合着对汤永芬思想活动的描绘，雕琢着汤永芬思想感情起伏的波纹。汤永芬的丈夫沈金鑫是个“火烧脚背不发慌”的人，在他们夫妻俩的对照映衬中，也加强了汤永芬的形象。

在艺术构思上，王火同志的作品讲究章法和严谨。他的作品往往起步不凡，善于很快地提出问题，造成了强烈的悬念，引人入胜，然后有条不紊、从容不迫地展开情节，逐渐把情节推向高潮。《错误的歉意》首先从宿勋的一张留字写起，“我看到这张字条，心头浮现了宿勋的面容，浮起了歉意，‘我不禁想：‘四人帮’粉碎三年了！这种歉意难道还要再折磨我下去吗？’这是为什么，歉意从何而来？宿勋是个什么人物？这就强烈地吸引着读者去追根寻底。而在造成强烈的悬念以后，作者却以舒缓的笔调，从容不迫地抒写着宿勋和他的不平凡的经历，以及“我”对他的生活道路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因而一直抱着负疚的感情。而在作品的结束，描绘了他的歉意的释然，错误的歉意变成了“记忆中的花朵”，与开篇相呼应，使作品浑然一体。《不要飘带的花圈》，写的是母与子的矛盾。作品首先在烈士陵园的特定环境中，在母子共祭儿子的生父、张麓枫烈士的时刻，把矛盾揭示出来。然后，作者叙述了这位革命母亲和儿子继枫、儿媳黄萍的矛盾的由来和矛盾的焦点。继枫受世俗的影响，把烈士父亲作为自己的资本，就是在祭父灵的时候，也忘不了在花圈上把父亲的名字写上，然后在花圈前拍照留念，借以炫耀自己。而母亲所想的，不仅是要祭奠自己的丈夫，也要祭奠千百个革命烈士，她要求儿子不是用烈士父亲的招牌去装点自己，而是要继承父志，发扬革命传统。作品的后半部是革命母亲给丈夫的一封信。这封信既是过去战斗经历的描述，又是战

友般夫妻情的抒发，也是对革命后辈的殷切期望，更是一个革命老干部共产主义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坦白的胸襟的剖露。最后以小枫的悔悟作结，完成了作品的构思。作者说他这篇小说在结构上采用了电影手法，这是有意识的探求。是的，王火同志是重视我国的文学传统的，重视作品的民族化、大众化的，但他并不拘泥于传统，把民族文学传统作为发展自己的艺术特点的基础，而不是把它作为自己创作的框框和绊脚。

王火同志的短篇小说创作已经取得了丰硕成果，可以说，他的创作道路是健康的，他的作品思想性是深刻的，在艺术上是有特色的。当然，王火同志的小说也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篇目之间的水平也是有差距的。我感到王火同志在创作中坚持现实主义，坚持从生活出发是值得称赞的，但与此同时，总感到在艺术的提炼、艺术的想象和发挥方面还做得不够。如《马庆贞》这篇作品，主题是好的，但仅仅局限于一般好人好事的叙述，而没有在丰富生活基础上对情节加以提炼，在塑造人物上下笔墨，所以便流于一般，缺乏感人的艺术力量。坚持从生活出发和加强艺术的提炼，发挥艺术的想象是可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的。我这样想，如果在一些作品中，王火同志能够在深厚的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艺术想象力，大胆运用典型化的方法，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会较现在为高的。王火同志有些作品，政治术语用得较多，读来感到枯燥。文艺的教育作用主要靠艺术形象，要在潜移默化之中。个别作品也还有斧凿的痕迹，如《春燕第一只》就给人以一种编故事之感。

王火同志年逾半百出现了创作的旺盛期，这说明了党的文艺路线和政策，深得作家之心，说明了王火同志有深厚的生活基础和艺术功力。杜子美在评论庾信诗时曾说：“庾信文章老

更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庾信生平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我想借用杜子美的这几句诗，祝愿王火同志在文学创作上攀登新的高峰，开拓新的局面，取得更丰硕的成果。

任孚先

1982年12月

目 录

序.....	任孚先(1)
心弦铿锵	(1)
海啸曲	(25)
春风桃李	(44)
马庆贞的奇遇	(61)
红斧	(68)
滚烫的回忆	(83)
错误的歉意	(112)
丑角	(128)
新“三岔口”	(135)
不要飘带的花圈	(157)
“东方威尼斯”一个京剧女演员的传奇	(166)
惯宝宝	(188)
春燕第一只	(204)
迈向美的足印	(218)
“时间小人”	(229)
网上的蜘蛛	(240)
复杂的颠倒	(253)
后记	(293)